

德國現代史(1880-1920)中韋伯政治觀之探索

洪鎌德

交通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摘要

本文以德國現代史(1880-1920)四十年間政經社文的變遷為經，和以韋伯生命史由青年至壯年及逝世的近半個世紀之經歷為緯，析述他對學術和從政的心路歷程，從而編織一幅時代與個人互動的圖像，進一步探索韋伯政治思想的演展。出身於布爾喬亞官宦之家的韋伯自幼耳濡目染其父同高官達人的評時論政，萌生對政局和時事的興趣。大學時代受自由主義者的姨丈之啟發逐漸形成國族主義兼自由主義的開放的心態，亦即國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融合。其後講學、評時、論政主要討論新教倫理促成資本主義的興起；社會主義最終造成幹部專政，形成官僚科層制當權和百姓失掉自由。歐戰激發韋伯參政的熱忱。戰敗後以獨立人士身分參與和會和『威瑪憲法』的起草，希冀建立政治新秩序，其理想為公民複決和公投選出英明領袖統治的民主體制。要之，韋伯的政治思想散落在其著作、演講、談話、通訊之中，未形成一個統一的體系，本文只是想法勾勒其大要而已。

關鍵詞：國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融合、歐戰、資本主義的源起、社會主義的弊端、公民複決權施行的民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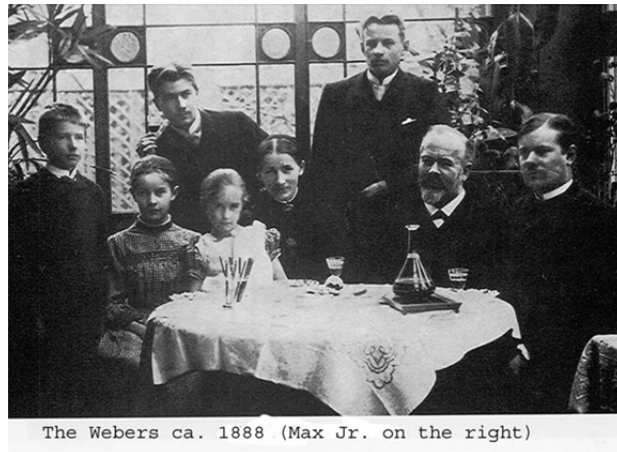
壹、前言

西元 2020 年 6 月 14 日為當代德國最為卓越、影響遍及全球的哲人和社會科學家之瑪克士·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一百週年忌辰。在舉世為武漢肺炎肆虐而疲於抗疫之餘，歐美學術界和文化界都不忘舉辦研討會、座談會、演講會等集會方式、或撰文結集等出版方式來紀念這位人文和社會學界的大師。儘管他只活了短短五十六個年頭，他在歷史學、文化人類學、法學（憲法、法律哲學）、法律社會學、政治學（國家學、行政學、國際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宗教社會學、文化學都有大量和精湛的著述留給後世。他被尊為現代社會學三大奠基者之一，另二位為馬克思和涂爾幹。

本文主旨在討論韋伯的政治觀。如有所貢獻是因為華文世界至今只對韋伯的認識論和方法學有過討論，對其析述資本主義有所介紹，對其強調正當性和合法性以及官僚科層制有所評析，而獨缺檢討他的政治言行和思維，尤其把他大學時代之後四十年的政治思想做一簡述，乃為本文作者向他博學慎思敬意的表示。

韋伯出身政治世家，其父擔任過市長（Erfurt）、市政參議（Berlin）和國會議員（第二帝國），對一家八個（兩位早夭）兒女之長男的瑪克士刻意栽培，以繼承其志業。這是韋伯終身熱中和積極參與現實政治的基因。他先後在海德堡、史特拉斯堡和柏林大學就讀，專攻歷史、法律、經濟、政治，亦即綜合性、廣義的國家學說（Staatswissenschaften）。學生時代加入團體活動喝酒、比武、胡鬧在所難免，是傳統德國大學生時代的習俗。他遲到逝世前一年半才退出學生會組織，認為德國學生團體（Verbindung）有「精神的亂倫」（geistige Inzucht）之嫌。因為出身布爾喬亞市民階級的家族，所以自小便傾向發揮德國民族精神和提升德意志文化的國族主義，某種程度上接近文化帝國主義。加上其父曾為國家自由黨領導者之一，此外學習過程中一度嚮往英國議會民主，因此，他的政治光譜屬於自由派「偏左」的開明人士。晚年被國家民主黨提名國會議員，竟遭同黨人士排斥，無法

效法其先父進入國會議政。之所以說他思想偏左，乃是由於他雖然批評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但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和工團主義者時有接觸和鼓勵的緣故。



來源：Kaube (2020: 256)。

說明：在其父左邊坐者為瑪克士，拍照年代為 1888。

圖 1：韋伯全家照

貳、青年韋伯的政治觀點之演展

馬克思青年時代發展了獨特的思想體系，也就是異化論，而有別於壯年的階級剝削論，遂被後人稱爲他擁有兩個馬克思主義（洪謙德，2018: 208-209）。相比之下，青年韋伯的政治觀點，剛剛起步醞釀，還談不上型塑體系。不過由於自小及長耳濡目染父親同國家自由黨領導人和國會其他政黨負責人，乃至政府高官及學界大儒（如 Wilhelm Dilthey、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不但現實政治，就是一般政治成爲他的最愛，最終成爲他的「志業」（Beruf; Berufung）。韋伯既然視從事政治活動，選擇從政，或是從事科學工作都是像馬丁·路德所宣示的 Beruf, Berufung（英譯爲 calling, vocation, profession），亦即上帝的召喚，我們則譯爲「志業」。無論是召喚，還是職業、還是志業，在在說明這些專業的源頭對韋伯而言，與宗教有關，這也

是他何以在熱中政治、法學、經濟和歷史之外，對世界各種宗教產生研究析述的因由。

年屆十八歲的青年韋伯離開父母進入海德堡大學選修羅馬法、經濟學史、17 與 18 世紀歐洲史、聽大史學家藍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日耳曼諸族史，不過這些選課對他的政治想法影響不大。真正啓發他政治意識的是其姨丈史學家鮑姆加田 (Hermann Baumgarten, 1825-93)，這是一位和老韋伯隸屬不同派系的自由主義者。青年韋伯在位於史特拉斯堡的史學家之住宅居留數年，不僅與姨丈大談當時政局 (Kaube, 2020: 55-62)，愛上表妹愛眉 (Emmy)，但戀愛未有結果 (Radkau, 2014: 39)。曾從事新聞業的姨丈為 1848 年歐洲各地爆發革命的支持者、歡呼者，革命失敗後轉而變成史學家。在 1893 年韋伯與遠親瑪麗安妮·施尼特格爾 (Marianne Schnitger, 1870-1954) 結婚，後者後來也成為了一名女性主義者和作家，曾經撰寫第一本韋伯的傳紀 (Marianne Weber, 2009)。

青年韋伯一方面受到其父保守的自由主義之型塑，他方面又迎接其姨丈開明的、進步的自由派理想，可以說年紀輕輕便成為國族自由主義者 (National-Liberaler)。其父對俾斯麥由反對到支持的搖擺立場導致反對派的左翼自由黨人之抨擊。雖然企圖獲取當權者青睞，有時也會發發牢騷，指摘鐵血宰相將其身邊的惛惛之士消滅殆盡。這種說法成為其子後來給予俾斯麥的評斷。但老爸這種逍遙自得，貪圖逸樂的布爾喬亞劣根性 (Marianne Weber, 2009: 57)，卻也是導致父子失和的原因之一。

韋伯並不完全接受鮑姆加田灰暗色帶有悲觀的時局看法，而是在與姨丈爭論中培養出冷靜、客觀和獨立的判斷 (Mommsen, 1974: 7)。姨丈的啓誨是把這個好學深思的侄兒從其父親狹隘的國族觀解放出來，使年輕人看透俾斯麥體系的內在虛弱。此外，姨丈傳給他的是政治之核心在推出才能出眾的領導人和培養公民判斷公務是非的能力 (Mommsen, 1974: 12)。姨丈的論敵為鼓吹國族主義的大史學家特萊奇克 (Heinrich von Treichke, 1834-96)，此君對俾斯麥統一全國功勞大為讚賞，其聽課學生也受鼓舞成為首相的信徒。青年韋伯對其同窗的英雄崇拜大不以為然，常加辯駁。他指摘特萊奇克學術客觀的不足。但在柏林大學這位深思熟慮的大學生卻上

了史學家兩門研究生課，特別是「政治學」，而把其中的菁華加以吸收，這包括權力的概念、民族國家的活動足以提升到政治行為的規範、小邦國存在之預測等等。韋伯著名的佛萊堡大學就職演講（1895.5.13），主張第二帝國應成為世界列強之一，這種霸權思想源之於特萊奇克海外擴張說。柏林大學後期的學習年代韋伯少上講課、多自修，選讀的課程多涉及經濟和歷史，為其博士論文〈中世紀商社史〉做好準備，較少接觸政治理論。



圖 2：學生年代的韋伯(左) 來源：Kaube（2020: 256）。

圖 3：撰寫韋伯一生傳紀的夫人(中) 來源：Kaube（2020: 256）。

圖 4：夫婦暢遊義大利(右) 來源：Radkau（2015: 124）。

在這段學生年代，青年韋伯已養成對政局有獨立判斷的能力。這表現在他反對俾斯麥的社會黨人立法之態度上，蓋此法嚴重傷害人人在法律之前完全平等之自由主義底原則。這種反對態度連其父和姨丈都無法趕及，因為他們欠缺正義感而視這一惡法乃為必要之惡。青年韋伯的後期為 1870 與 1880 年代，也是德國國民自由黨走向分裂與衰微的時期，他與其父親和姨丈屬於自由主義左派，除了重視個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的保障之外，也關懷底層民眾的福祉。1887 年他加入年輕政治經濟學家所組成的團體，亦即「社會政策協會」，這個協會被貼上「講壇社會主義」（Kathedersozialismus）的標籤，他的入會可謂他政治意識途上由右轉左的開端，也就是要求政府不再只關懷經濟隨市場的供需而自由運轉；反之，國家應介入平民的經濟生活，有助於民眾公平的追求。在此一時期他積極參加宣揚這一講壇社會

主義放的組織之活動（Mommensen, 1974: 17）。因為在社會政策協會的資助下，青年韋伯有機會從事經驗性的實地調查工作，亦即易北河東岸農民身分的調查。其調查報告，建議該地的地主（普魯士的封侯 Junker）應放棄僱傭廉價的波蘭勞工。這種建議得罪了東普魯士的權貴，卻使年青的韋伯一夕成名。

參、後半生的韋伯政治思想之演變

韋伯的後半生應從 1891 年獲取教授資格算起至 1920 年近三十個年頭。在這三十年間他在政治思想的領域碰觸到下列問題：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國族權力國家的政治理想；當成德國未來美夢的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內政的發展；外交政策和內部憲法爭論；捲入一戰的德國展示大國實力與破綻；國家戰敗與革命四起：『威瑪憲法』的起草和頒布等等議題。

一、長老制度、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

18 世紀與 19 世紀上半葉的德國表面上為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聯邦，卻是國土分裂，王國、公國、共和國、自由城市互爭雄長的地理名詞，而非以日耳曼民族和文化建立做的統一、自主、獨立的民族國家。這個仍處於封建體制之下、工業革命比走起鄰國做的英、法、荷大為落後的德意志民族盤據之中歐「帝國」，其政制式樣繁多，仍脫不掉長老制、家長制（Patricharismus）之框架。可是這種一家（群體、國家）之中經由傳統或世襲規則建立的單人統治卻在衰敗中。換言之，人治正邁向法治，資本主義利潤取向超越封建體制之下人情血緣關係。19 世紀初圍繞德國鄰國大多成為以種族、語言、文化、習俗相似而結合的獨立自主國家，韋伯稱之為合乎理性的民族國家，他一度主張易北河以東毗鄰波蘭邊界、住有大批波蘭農民的東普魯士應當「日耳曼化」。這是 1890 年韋伯接受社會政策協會委託對易北河東岸農工社會調查的結果，成為他對現代國家定調的一部分（Anter, 2014: 67-70）。

二、國族式的權力國家和大國夢想

國族式的權力國家或稱民族的權力國家（*der nationale Machtstaat*）是韋伯對第二帝國的期待，這可以從他在 1895 年五月中旬佛萊堡大學就職典禮上的演講看出。這篇題為〈民族國家和經濟政策〉（Weber, 2004: 1-27）。他說經濟政策的科學就是政治學，它不在為權力者或統治階級日常處理的行政服務，而在保衛國族長期的利益（Weber, 2004: 14）。這不只顯示他學術生涯的開端，更鋪排他政治理想的綱目。其中以易北河東岸農民之調查談起，認為國民經濟就要討論德國做為一個國族（*nation*）的經濟狀況，因此自認為「經濟國族主義者」。他說，一位德國經濟理論家的經濟價值設準必須是德意志的，這聽來和他之後所主張的學術工作應卻除價值完全衝突。要解除這種矛盾和衝突只能說國民經濟學要排開富國裕民或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而把最高價值擺在國族之上。這種追求權力國家的理想成為韋伯大國的美夢之一部分。另一部分則為精明領袖與遵守秩序有紀律的國民所組成的民族國家。

三、歐戰前德國政局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一般所稱的歐戰之前德國面對內政與外交發展路線相爭的問題。這反映在韋伯心目中則是本國擺脫封建體制走上工業化、城市化、鐵道運輸化和經濟起飛的現代化大道，以及海外殖民、擴充經濟地盤的政治現實的問題。當年東普魯士大地主與反資本主義的擁有小片土地的小農之聯合，無異為對抗工業化潮流之封建體制底起死回生。這說明 19 世紀後半葉剛統一的德國分裂為東邊大地主階級所掌控的農業區和西邊以工商人士推動的現代化立國之工業區。對此分裂韋伯堅決反對保守派的主張，而站在現代化、工業化、資本主義式經濟政策推進的一方。他認為這樣才能與德國世界政治的外交目標相配稱（Weber, 1992: 31）。德國要像瑞士那樣靠農業自給自足和倚賴大地主的支撐是不可能的（GPS, 113）。韋伯認為國族的社會統一（*soziale Einigung*）之目標為保障工人自決的權利和教育工人負責盡職。但他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社會主義者

會從資本主義承接官僚制度，執行更為繁瑣嚴厲的規定，而眼制人民的自由（Weber, 1976: 129）。反之，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工人有上升改善生活之機會。

1890 年代初韋伯結識發揚基督教慈悲精神，關懷底層勞工福利的牧師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後者後來（1919）創立接近 SPD 的左明翼政黨，亦即德國民主黨（DDP），極力拉攏韋伯參與政治。由瑙曼於親近威廉第二，而遭受韋伯批評。他解釋大言炎炎、矛盾處處的牧師兼政治家之瑙曼之所以始終成為他的好友和伙伴，是因為在大學者心目中，政治和科學隸屬於不同的規則之緣故（Radkau, 2015: 338-39）。

四、俾斯麥和威廉二世外交政策之失敗

在 1890 年俾斯麥垮台之前，韋伯對鐵血宰相的批評，就是氣度狹隘無容人之量，不能被視為大破大立的政治家，而是靠官僚系統施政的統治者。因為政治家需具狂熱物的本質和負責盡職的精神。俾斯麥外交政策只想在歐陸稱霸，而無意在海外殖民擴大，而與韋伯期待的聯結英國成為世界強權（Weltmacht）之理想相違。在 1918 年年底他表示德國早應與英國取得諒解，求取合作，「這不僅基於單純政治的考量，更是由於共同文化的理由」（Radkau, 2015: 489）。事實上，大部分當年的自由份子對鐵血宰相在 1878 至 79 年把他們逼到牆角一事非常氣憤，連韋伯之弟 Alfred 在 1937 年憶往時，仍在埋怨不已（Radkau, 2015: 338-39）。令大學者難堪的不是首相的軍國主義和跋扈專斷，而是藉全民投票權來摧毀人人平權，阻止社民黨發展勢力和扼殺自由主義的生機（Marianne Weber, 1936: 53）。這也導致老韋伯在國會無法連任。韋伯認為俾斯麥的建艦政策在對付國內反對派聲浪，而非導致仇恨英國的主因。

依據韋伯的看法，威廉二世外交政策的失敗在於不得體的時局評析和炎炎大言的錯誤。在其統治後期德國外交圈活動的囂張，都是這位皇帝野心的表現。他指摘皇帝「個人的嚴管」（persönliche Regiment）危害了第二帝國內政與外交的存在（Mommsen, 1974: 158-65）。



圖 5：鐵血宰相俾斯麥
(1815-96) (左)

來源：Wikipedia (2020: Otto von Bismarck)。

圖 6：德皇威廉二世
(1859-1941) (右)

來源：Wikipedia (2020: Wilhelm II, German Emperor)。

五、憲法改革運動的推動

二十世紀初歐洲局勢的發展，提高了韋伯對德國外交政策只重「皇朝威信」做法之疑慮。英俄有關中東和亞洲勢力範圍分割的協議，使歐洲均勢失衡。這不但削弱德國成為世界文化大國和列強之潛能，更威脅到它的安全。由於外交之失敗引發內政危機。1908 年在大學者對皇上公開批評後，各方要求修改 1871 年帝國憲法的呼聲此起彼落。自由派公法學者耶林內克 (Georg Jellinek, 1851-1911) 雖然不敢主張仿照英國和比利時採用國會統治制，而讓皇上成為「影子元首」(虛君)，卻在憲法第十七條首相對國會負責的條款，補上執行規定，也就是國家大政交給首相擔當。對此草案韋伯提出修改意見，主要是涉及首相不信任所需國會 240 票和聯邦議會 24 票之建議。表示他對憲政改革關心和努力的一斑 (Mommsen, 1974: 159-65)。

六、韋伯與歐戰

歐戰的爆發並不令韋伯感覺意外，反而成為他檢驗德國做為世界強權之一的試金石。他認為只要德國文化在 20 世紀能夠在世界史上佔一席之地，捲入歐戰是無可避免。「我們理當成為一個權力國家，理當冒戰爭的危險，俾為未來世界決定過程有個發言的機會」(Weber, 1971: 176)。但這個被稱做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歐戰卻轉變成德國生存之戰，可讓大學者跌破眼鏡。

一開始他認為災難式的外交會陷德國於戰爭邊緣。開戰之初的 1914 年夏全國為求國家生存而展示了團結亢奮和準備犧牲的樣態令他動容，儘管他對當局的無能批評之聲不斷。從頭至尾他懷疑德國會從這場戰爭中贏下來。可是韋伯天生的國族主義的情愫導致他對戰局的樂觀期待，特別是當德軍在 1915 年五月越過舊波蘭而向東挺進之際。

即便是 1916 年八月羅馬尼亞參戰，情勢對德國不利之際，他猶抱樂觀的幻想。其實，韋伯曾認為中歐小國靠統一的德國之帶領而獲取安全與繁榮，亦即在其內政上各小國自主，在外交上依賴德國的指揮，不過他反對德奧合併。這是由於他早期在東普魯士農工調查中日耳曼化所取得的見解，擔心以奧國倚賴農業導致生產落伍，拖累工業先進的德國。合併政策不僅針對奧地利，連比利時也一度成為德國學界合併討論的目標，除了參加 1,347 名「知識份子」向皇帝陳情外，韋伯兄弟還高喊反對這項合併建議。但德軍還是征服了比利時。在 1915 年五月寄自布魯塞爾的信上指出「這個美麗的法國式城市怎能忍受德國統治的魅魘呢？」（Radkau, 2015: 460）。

七、戰敗與和約

在 1917-18 年德國軍部把其東線精英部隊調往比、法西部戰線，準備一舉消滅英法協約國聯軍。這一企圖失利之後，加上美軍參戰導致德國境內社民黨（SPD）和激進而又獨立的 SPD 停戰、反戰之聲甚囂塵上。1918 年十月基爾爆發革命，為其後德境連環革命之始。碼頭工人的起義影響水手的騷動。次月社民黨執政的新政府向協約國聯軍要求停戰，此舉等於投降。由於七百萬陸軍和水兵團結成保守力量遂阻止 1918-19 年德國的赤化（柏林和慕尼黑共黨革命）。

隨著德國的戰敗，韋伯促使本國如同英、法、俄、美躋身世界列強的美夢宣告粉碎。面對危機的加深，他還建議德軍從比利時撤出佔領，和阿爾薩斯以及洛林的割讓，這不是屈服於協約國需索，而是出於威爾遜的仲裁。他對軍隊的潰敗之擔憂，遠不如敗戰所造成的財政負擔之嚴重。巴伐利亞邦日漸增強的分離趨勢使他憂心，尤其隨後爆發的慕尼黑革命和建立的蘇維埃式委員會共和國（Münchner Räterepublik）令他沮喪。「革命只是

犧牲無產階級的語言遊戲——其結果成為國家之敵，也變成反動——而付出代價自的卻是無產階級」(Marianne Weber, 2009: 27)。有異於他國會改革的開明，對戰敗帝國皇室的退位和君王制度的保留，顯示韋伯保守的心態(Mommsen, 1974: 312-13)。

做為凡爾賽和約德國代表團員之一的韋伯對代表團在和會上之表現相當不滿，原因是德方自覺啟動戰禍而有負荊請罪之表態。以這種謙卑自貶的身段，求取敵方的在和約上讓步，不符合敗戰的大國之風範。他認為代表團應當為德國討回尊嚴。面對割土、賠款、外國佔領的威脅，韋伯只能呼籲群眾與學生採用革命的手段進行反抗。波蘭人佔據但澤激發韋伯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他大聲疾呼；為收復失地所做的奮鬥才是真正國族主義者的任務。凡爾賽和會對韋伯打擊很大，導致他決心退出政壇，重披學術舊袍，作為晚年應景之生活方式。

八、『威瑪憲法』的起草

1918年十二月德國內政部成立一個新憲法研討委員會，邀韋伯加入討論制憲。他強烈主張德皇遜位後帝國首腦應當民選和國會有權質詢國政。這兩項可說是他晚年政治思想的核心(Radkau, 2015: 511)。他一再呼籲「未來帝國的首腦應當由國民直接選出——〔因為他的權力建立在〕全體國民的意志之上」(Weber, 1994: 104)。

此外，他對英國議會制度中議員有質詢權大為推崇，因為人民賦予代議士有力的武器以抗拒內閣各部會官僚的囂張。國會質詢權終於寫進『威瑪憲法』的草稿中。在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個版本草擬中，韋伯幾乎是唯一以無黨無派的獨立人士專家的身分參與新憲的草擬。韋伯晚年脫離各種政黨活動，一面教書、一面撰稿。他的政治思想圍繞在德國如何培養、拔擢和選用魅力型的領袖，俾鬆散的加盟各國（邦、州、市）能夠凝聚成團結成為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這就是他津津樂道的凱撒型大權在握的國家領導(Cäsarismus)。在古羅馬時代率軍征服外邦而贏取勝利者、或是在同僚權鬥中勝出者，在下屬不斷複決首肯下，獲得部下和人民的擁戴，便成為凱撒型的領袖。韋伯期待未來威瑪共和國在取代德皇的專政，變成有權

複決國政之庶民公投選出的統治與領導（plebiszitäre Herrschaft und Fuhrerschaft）。這是卡理士瑪（Charisma 魅力）轉向民主的表現，而其領袖成為轉型過程的關鍵人物（Weber, 1968: 266-71）。庶民領袖在呼應民眾的信托，相信他一人可以代表全民的意志，一如拿破崙一世和三世的作為。

肆、韋伯對資本主義的詮釋

韋伯如同馬克思一樣視資本主義的活力具有把傳統社會消解破壞的能力。因之，他指出：「資本主義是現代生活涉及人們命運最大的勢力」（Weber, 1930: 17）。馬克思與韋伯所體驗的德國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不只是經濟的過程，而是衝擊整個社會，改變社會的力量。這使兩人發現資本主義不只影響了家庭結構、政府組織、人格形成，連對科學、藝術、文化諸面向也產生震撼的作用。

韋伯在 1904 年與 1905 年間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彙編》學刊上發表了震撼學界的大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後，他的聲譽日起，一躍而成為國際知名的學者。在這篇著作中，韋伯採取了與馬克思迥然相反的方式來討論資本主義的興起和運作，其方式大異於馬克思以歷史唯物論的物質主義之觀點來分析與批判資本主義。不過，韋伯卻強調他切入的方法並非片面的唯心主義的途徑，而是以一種啟發新知（heuristic）的手段，在宏觀的社會學層次上來提出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的假設。因之，他無意藉此文的發表來拒斥馬克思主義，只是要藉理想類型的建構，在理論與學術的層面上，檢驗馬克思理念的正確與否。他明顯地反對馬克思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一個總體。因之，馬克思的史觀在韋伯的心目中也是另一種的理想類型。事實上韋伯所努力的不過是探討現代性而已（Weber, 1930: 17）。

此外，韋伯顯然懂得分辨馬克思原始的想法和後者的徒子徒孫（亦即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解釋之分別，他譴責庸俗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哲學上的貧乏，機械性、非辯證的教條式的訓諭（catechism）。韋伯排斥這種「幼稚的歷史唯物論」，蓋這種唯物論把資本主義的精神與風範之起源，當做「經濟情況」的上層建築，或是當做經濟

基礎的反映來看待（Weber, 1958: 55, 283, 217）。

韋伯知道社會科學的可貴之處，在於透過歷史的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因之，同是資本主義的課題，他便比較古代羅馬、中古北義大利和近代荷、英等地，也比較了基督教不同流派（天主教、誓反教、喀爾文教、大英國教）分佈地區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探究古中國與印度未出現資本主義之因由。研究印度與中國更增強韋伯對宗教會造成阻擋資本主義之產生與發展之看法，譬如說印度喀斯特（階級）制度，禁止個人職業的更換，與西方近代打破行會的壟斷剛好相反。由是可知宗教信仰對經濟制度所產生的衝擊。依據韋伯的說詞，猶太教傳承給基督教有關禁止壟斷與巫術的濫用，就是造成西方人崇尚理性的源泉，是故去魔術化成為理性的經濟技術浮現的先決條件。但宗教理念也常為宗教帶來未曾預期的結果，例如宗教改革的世俗化、日常化，其後導致人們對宗教本質的懷疑，最終放棄了宗教的信仰，便是一例。

韋伯指出中世紀天主教會規定教友必須時時告解懺悔，是以個人對人生的意義完全由日常瑣碎行事與禮拜日的告解中略窺一二。除了僧侶有時間去思索人生，一般常人、俗人的赦免，完全靠教會這種跡近施放魔術的告解行動。是故有路德的反彈與宗教改革。他堅持每個人的信仰是教友與上帝之間的對話，不需教會或僧侶的介入。他引入了「召喚」（Berufung, calling）的觀念，認為每個人（不限於僧侶）都會受到上天的召喚去認真工作與禮拜上帝。

喀爾文引伸路德召喚的意義，認為上帝是超驗的存在，並不活在塵世之經驗世界中，人是否被召喚變成上帝的選民，不是任何一位教友死前就會知道的。人既然不知自己是否獲得上天的恩寵得以拯救，則只有在有生之年，於現世中拼命工作，勤奮工作是對上帝光榮的禮敬。一個人如何才能成為上帝的選民，那就是要去掉人的自然性、動物性，而對自己的生涯有理性的規劃。人在現世可以累積財富，但不得將財富濫用於歡樂之上。既然人可以擁有財富，但又必須清心寡慾，則財富的不立即消耗便可以再投資，由是資本累積愈來愈雄厚。清教徒這種相信個人成功的事業、勤奮的工作和清心寡慾，是他們被上帝選擇與獲得拯救之途，這也就形成他們

為一群堅強而富理智的中產階級之成員。新教中產階級的驕傲，產自他們獨立不屈的奮鬥意志，不容許外物干擾個人在現世的命運，不屈服於世俗的權威，只堅持內心孤獨的信仰之純真。這種階級的驕傲也帶來清教徒的獨立自主與行事的斬釘截鐵跡近殘酷的性格。清教徒反對感性，也反對自動自發、隨興所至而流露出來人的本性。在政治上，清教徒反對專制和威權政府（高承恕，1958：61-70）。

要之，韋伯有關資本主義的制度之說法，是不認為這些典章制度機械性地從封建主義演展出來。反之，這些典章制度出現之前，社會有其特殊的價值、特別的心態的要求，其目的在使資本主義發展的潛力得以發揮。16 與 17 世紀英國的社會史和清教徒的經濟角色剛好提供給韋伯發展理論的根據，使他相信宗教理念在歷史發展上所引發的作用。清教徒在英荷的表現，以及路德教與天主教在德國的保守作為，成為一大對照（姜新立，1997：212-16）。

韋伯在涉及喀爾文教時，提出兩點的看法：其一，喀爾文教徒的價值觀便利了資本家的活動，提供清教徒追求利潤、財富的意識形態；其二，清教徒在擁有這種價值觀之後，將其人格變成中規中矩，跡近冷酷無情的企業經營者。就是清教徒內心的這種絕情無義與堅強信仰，使他們揮別傳統，告別權威，不受教會與國家的羈束。宗教觀念的內在發展以及清教徒性格的堅忍強悍，是經濟活動的先決條件，也是造成中世紀社會體系崩潰與革新的動力。韋伯把意識形態和心裡的變項插入於歷史的分析中，使馬克思視為當然的社會現象有了更細緻、更深刻的解析，這是韋伯補足馬克思粗枝大葉的地方（Birnbaum, 1991: 7-17）。

韋伯如同馬克思一樣對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結果均抱持熱烈探討的興趣，因為這個歷史新現象是獨特的，其影響面不限於歐洲，甚至擴大到全球。此一經濟現象之特徵為生產工具為少數人所把持，而眾多的勞工卻在所謂勞動市場出賣他們的勞力。表面上出賣勞力的方式是自由的，實質上勞動力買主與賣主完全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而其間買賣競爭的激烈與慘烈也是空前的。生產效率成為新的社會價值，它是以理性、創意為美名，對人力做無情的壓榨與剝削。在資本主義崛起的時代經濟行為以利益為取

向，只要能夠賺取與擴大利潤，什麼手段皆可使用，皆可被合理化、正當化（Birnbaum, 1953: 135-36）。

理性便在衡量手段目標之間，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較）大的效果。工業社會不限制一個人從出生至死亡只固守一個行業，也不限制人們追求利潤的極限，是故一個人只要有利可圖，可以跨行跨業，進行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因之，合理性是對經濟手段不斷的批評，不斷的修正，不斷的選擇，而非把經濟手段神聖化。韋伯與馬克思同認為合理性原則就如同中世紀對行業的阻止、禁絕、規定一樣，都是隨意的、人造的、受歷史與社會環境制約的，而非自然的、神聖的、普遍的效準。

由於合理化原則的廣泛應用，不只在經濟生活，也在社會與政治生活成為現代人的行動之指針，從而可說合理化塑造了現代人的精神、心靈和文化，構成了文化或時代精神（ethos）。由是國家也逐漸從傳統的束縛轉變為合理而又合法（rational-legal）。這種合理而又合法的現代國家的出現，在韋伯看來，便是西方所以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洪謙德，1998：160-71）。

由是可知韋伯把資本主義看成以合理和合法的手段、藉市場的供需、利用會計、簿計的得失精算、在法律與官僚的協助下，達到資本家謀利致富的目標。資本主義乃是一種「經濟體系」。但這種經濟體系卻展現不同的面貌，在古代家長制之下為政治性的資本主義，在近現代則顯示理性的資本主義。所謂政治性的資本主義，是指利潤和利益的謀取要靠國家的協才有可能。這種以「政治為導向的資本主義」（politisch orientierter Kapitalismus），其謀取財政上的利潤是靠國家發動戰爭，發戰爭財、或是藉國家對外殖民掠奪殖民地的資源、或靠國家或其代理人進行「非正常的金錢交易」（Weber, 1976: 124, 670 ff.）。由此可見韋伯談經濟體系自的資本主義時，仍然不忘政治和國家。

伍、韋伯與社會主義

韋伯一生接觸不少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社民黨人和各種各派做的左翼人士，包括女革命家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81-1919）。他

平生研究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當然對聲勢最大的社會主義的主張知之甚詳。有關社會主義的專著為 1918 年發表的短文〈社會主義〉（Weber, 1994: 272-303）。另外，他計劃在 1920 年夏學期於慕尼黑大學講授一學期「社會主義」的課程，卻因病逝而不克完成。

由於社會主義的定義雜多和分歧，韋伯只拿它來與私人經濟做一個對照。這就是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並列和比較。他在《經濟與社會》的第二章指出：談經濟組織的效率，資本主義非常講究，但社會主義卻把資本主義最有效這一部分拿走，包括拿掉企業經營和工人不安的工作情景（Weber, 1976: 150 ff.）。這兩種不同的體制實施的結果，資本主義較能發揮個體的才能，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個人的自由大受限縮，資本主義流行的社會官僚抬頭，但社會主義實施的國度（如蘇聯建國之始）官僚更為囂張。在社會主義所推行的計畫經濟之下，有效的價格難以形成，因為它不建立在市場供需的原則之上。做為一種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是立基於自然法之上。

韋伯說，社會主義一旦落實，人類要蒙受一大災難。他又說，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中，國家與私人經濟分開和對立，可以相互監督和制衡，但在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中，只有強大的權力菁英決定一切、主宰一切（Weber, 1976: 103-105, 286）。「一旦私人經濟徹底被消滅之後，國家官僚制度將單獨統治」（Weber, 1976: 1402）。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工人將陷入貧困，因為所面對的是聯合團結的權力菁英。屆時不是普勞階級專政，而是官員獨裁（Weber, 1968: 292）。由此可知他有先見之明。一般而言，韋伯認為在社會主義實施的國度內官僚化會日趨嚴重（Weber, 1994: 279）。這種國度將回歸古埃及的暴政和奴役。在歐戰結束後動盪的年代裡，他極度反對德國境內的左翼革命活動。他說：「社會黨國會議員卡爾·李普克內希（Karl Liebknecht, 1871-1919）應當關進精神病院，而羅莎·盧森堡則該進入動物園」（Mommsen, 1974: 305）。因為此時此刻嚐試在德國搞革命無異在耍弄嘉年華會。

在討論社會主義時，韋伯喜歡拿它來與資本主義做比較。他所以推崇資本主義，在於資本家兼企業家的改變現狀的革命性格和除舊布新的創發

精神。換言之，在企業家身上找到動力和專精。他說（Weber, 1994: 39）：

假使私人的資本主義被消滅，則剩下國家的官僚單獨統治。本來政府的官員〔官僚〕和私人工業界的企業，原則上彼此可以相互對立和制衡，如今〔社會主義一旦建立〕官僚和企業家合為一體，形成龐大的上下不等階梯式的統治與隸屬關係（Hierarchie）。

在這種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自由不但沒有增多，反而減少。政府官員會採取低薪政策，工人被迫服從。沒有任何的行政或立法機構會伸出援手。資本主義靠動力和自由，社會主義則變成停滯和奴役。韋伯不認為在可見的未來，社會主義必然降臨。社會主義一旦出現，不可能改變人類的生存條件，反而使經濟發展倒退。他對現狀的悲觀，乃是忽視科技的進步對政經社文的衝擊，這反映其思想的保守（Beetham, 1974: 82-89）。

韋伯不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原來的人類會變成新人，屆時有權有勢的幹部以新官僚的面目來控制群眾，不再是擁有私財的上層階級，而是宰制群眾的幹部來發揮其企業家的功能。在工業資本社會中如何保障工人符合人道的生存，也必然成為社會主義體制下同樣備受關切的主題。他說：「目前政治和工業管理（卡特爾、銀行、大財團等）分別由不同的機構來執行，因之工業的權力受到政治權力節制，〔但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這兩種權力將合併成共同的利益，再也無人制衡他人」（Weber, 1992: 615）。韋伯期待國家藉其法律上的優勢，擁有壟斷性的暴力，可以超越國內經濟利益之上，在有遠見、有魄力領袖主導下，使用高明的策略化解利益衝突，整合各種動能使社會往正面的、進步的方向邁進。這是我們前面所討論過的魅力領袖主導下的公民民主。

陸、韋伯論民主

當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的實現極為樂觀，而深信民主最終的落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之際，韋伯則對這種的預測不感興趣。他倒十分擔心，他所處的西方社會造成民主化路途的坎坷不平，阻礙橫生。這樣的說法並不

意謂韋伯排斥民主議程上所牽連到的社會的德目（諸如公平、自由、安富尊榮之類）的追求。事實上，韋伯的政治著作透露他終身的奮鬥，也就是他掙扎在兩項可欲之間：一方是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嚮往；他方是德國民族主義和德國國際權力地位的追求。在韋伯有關政治學與政治社會學的著作中，民主政制是他非常關心的主題，包括古希臘的直接民主、民主政制中領袖的角色、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以及在德國境內有效和實際上足以發揮功能的民主。韋伯給民主如下的定義（Weber, 1994: 275）：

民主意謂各種不同的事物。在它本身意指在全民中沒有任何個別階級享有不平等的政治權利。

他進一步闡述民主為國家領導人爭取公民選票的政制。這就令人想起一段逸聞，亦即韋伯碰見國族主義者的盧登多夫（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將軍，指出：「在民主體制中，人民選出他們信任的領導人，然後領導人就說：『今後請閉嘴，一切聽我吩咐！』」（Weber, 1946: 42）。



圖 7：盧登多夫將軍（左）

來源：Wikipedia (Erich Ludendorff: 2020)。

圖 8：1917-18 年韋伯的肖像（右）

來源：Wikipedia 人物介紹 Max Weber。

在《經濟與社會》第三章中，他指出民主為反專制轉化為卡理斯瑪統治的過渡，（Weber, 1976: 159-166），所舉的例子為北美城市自治和瑞士各邦的自主。統治可以藉輪流當家或抽籤的方式來減少強制的感受（Weber, 1968: 189），這是民主可貴之處。在這裡我們依稀嗅到他有意引進正當性之第四種樣貌，亦即統治自的正當性源自「被統治者自的意願」（Weber, 1992: 752-56）。最後，這個第四種並未成案。社會的某些勢力在壓平被統治者的反抗力道，這就是民主化的過程：「負面的民主化」（Weber, 1968: 983-87）。

民主與教派之間存有選擇性的親近。但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卻不存在這種相似的親近性（Weber, 1994: 68-70）。這兩樣制度並存在西方世界只是歷史的巧合。資本家並沒有特別的民主化傾向，反之，他們寧願在其他人員不在場時單獨做出決策。

韋伯是否一位真實的民主信奉者引發爭議。他對民主持懷疑的態度是由於他認知論與方法論採批判的精神。基本上，在方法論方面韋伯避開大而無當的、包天覆地的寰宇性原理之提出。不過，在他的著作中，倒有幾項假設含有寰宇性的意味。所謂寰宇性的特質，就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的原則。這表示不容許有異例（例外）的情況發生。不過在歷史的變化中，卻容許這類原則、設準、假定有不同的面目與形式之出現，而非固守其本質。在韋伯的分析觀點裡，我們可以找到兩項設準同民主的考察有關：其一為演化天擇造成的不平等；其二為菁英的宰制。

首先，由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基於生物學與社會學的標準，社會秩序不是平等的，而是不平等的。亦即社會的結構就是一種不平等形式的結構。韋伯的第二項設準涉及宰制結構的無處不在：社會行動的每一部份是深刻地受著宰制（優勢 *dominancy*）的影響。「從不具形態的、散漫的社會行動逐漸浮現為合理的組合的一大堆例子中，可以看出這種合理組織的浮現是得力於優勢，以及在團體中這種優勢的主導作用促成的。就算是情形並非如此，優勢的結構仍舊決定性地規定了社會行動的形式，以及它怎樣朝『目標』取向〔定取方向朝向目標〕」（Weber, 1968: 941）。所謂的優勢、或宰制是指涉權威性的權力（洪謙德，1998：214-19），它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命令與服從的關係。雖然韋伯並不刻意把宰制的結構視同為不平等的結構，但很明顯兩者還是有關連，那就是說選擇（天擇）的過程，使優者、適者可以躋身於社會結構的領導地位之上（洪謙德，1998：253-58）。

韋伯對這兩項設準（物競天擇造成的不平等之必然性，以及宰制的結構無處不在的情形）所加以說明的絕對性描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兩項設準在韋伯的著作中尚沒有其他的設準（譬如和諧的社群關係）可以與之匹敵，與之相提並論。事實上，韋伯認為就是在一個和諧的社群關係中，

天擇是必要的，壓制也是普遍的現象 (Weber, 1968: 42)。在社群、或其他組織緊密的團體中，藉由協商所構成的同意之秩序 (consensual order)，只有在成員自動自發的同意下，才能成立和維持。其他型態的集體中，維持社會秩序，便要靠上下尊卑的統屬結構 (hierarchy) 之發揮作用，由優勢者、強力者將其意志硬性加在忍讓的、妥協的、屈從的成員之上。例如一國的憲法或一個團體的會章就是在標明特殊的限制，在此一限制範圍內，行政人員與群體成員 (公民或會員) 可以發揮其權限和展開活動，而供領袖的指揮驅遣 (Weber, 1968: 50-51)。換言之，韋伯認為官僚與人事制度的茁壯，為造成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先決條件。因此他把官僚制度看成制度變化中最重要的源泉之一。研究官僚和民主制度的關係至為重要 (洪謙德, 2013: 8-10)。

由於傾向於一開始便以上層的觀點來看待現象，這使韋伯的理想類型只看到對民主的阻礙，而忽視了權力的民主應用。他花費太多的注意力於資本主義體制和國家中的統治模式和菁英統治的反民主效果，而忽視了由下而上群眾對強勢者的對抗與節制的努力。古德涅 (Alvin Gouldner, 1920-80) 在對韋伯的官僚概念有所批評時，指出韋伯有關組織的束縛所牽連的權威性意涵就是反對民主的看法。韋伯忽視了對抗「寡頭壟斷的鐵律」有賴「民主的鐵律」才能奏效。「假使寡頭統治的波浪不斷把民主的橋樑沖毀，那麼這種反覆發生之事所以能夠不斷出現，乃是因為人們在每次氾濫成災之後，仍舊堅忍圖成重建橋樑的緣故」 (Gouldner, 1955: 506)。假使韋伯能夠把弱勢者 (不利者和被統治者) 的反彈，也置放在他普遍性的設準裡頭，那麼他必然會看出西方民主重大的成就，或許他對民主的前景將不致那麼悲觀失望。

柒、結論

本文先敘述 1880 年以來德意志由分裂走向統一，其後工業資本主義勃興，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實力提升和國族主義的精神昂揚。不料在 20 世紀上葉，因政治領導無能而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割地賠款、促

成第二帝國物崩潰，威瑪共和國的誕生。這四十年間剛好是韋伯從學生時代轉向教學、研究、撰著、評時論政，也是參政，甚至起草新憲之時，由是可見一向熱中政治的他，不僅對國家、政治所牽涉的現象及其歷史演變有理論的析述，還以問政和論政的實踐的方式投入政治志業。

總之，韋伯實際討論政治和參與政治大約不超過二十五年（1895-1920）這段不算太長的時期中顯示了他思想的變化和發展。例如早期對種族狹隘的看法，在易北河之東的農民生活條件與的調查報告中，他排斥斯拉夫人，特別是波蘭人的移入德境耕作，同樣在佛萊堡大學就職演講裡，也強調國族主義發揮的場域的民族國家之重要，但到晚年他把國族主義擱置，不認為種族和種族主義有何左右政局的能耐。歐戰剛爆發之際，韋伯同其他知識分子精神振奮而贊成全民參戰，以為戰爭或會還給德國一個公道，不料戰爭卻導致德國的戰敗。加上戰後社會動盪革命四起，令他痛心不已。

韋伯在歐戰前後所寫的時評常被看做學術性的文章，在敘述現代西方或俄國遭遇的挑戰或現勢，而忘記其背後問題的深刻分析。以致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和原創性常被混淆、被模糊（Weber, 1994: xi.）。事實上，他在討論現實事件之餘，與常比較今古、常比較東歐（俄）與西歐（德），從而顯示其思想的雙重性。但他對政治的看法從頭至終不變。對他而言，乃是在追求學術生涯之外他的至愛，也是讓他血脈賁張，以身相許的學術志業。也是他的「私愛或秘戀」（*geheime Liebe*）。在另一發個場合上，他強調政治家像硬木塊一般耐壓耐操，接受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韋伯對政治的概念離不開德國可能成為世界強國（*Machtstaaten*）之一的想法，這是當時其餘政治經濟學家普遍的看法，他們都認為世紀初強國崛起與「〔使用〕有形的暴力之壟斷性有關」。由此引申的政治之定義乃為競取「權力的分享或對權力分享擁有影響力，〔這種權鬥出現〕在諸國之間或在單一、國度之內各種人民群體之間」（Weber, 1994: 300-11）。對他而言，政治的本質就是權鬥（*Kampf*），就是衝突及其解決。政治的當務之極不在提升百姓物質上的福利，而是人類在其所處的社會和經濟秩序情境上的生活品質。政治經濟學作品的目標，在於「產生那些特質足以構成人們的偉大和吾人本性的高尚」。



來源：Kaub（2020: 256）。

說明：韋伯於 1920 年 6 月 14 日因肺炎逝世，享年 56 歲。

圖 9：韋伯逝世於德國慕尼黑

是故本文不只敘述韋伯青年時代的政治涵養，還進一步分析他對國族主義瀰漫下德國成為歐洲列強可能性的期待與失望。他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和民主制度推崇和擔憂之所在。總之，韋伯對政治沒有系統性的和明確性的論述，因此，本文也只能把他的片言隻語整理成他的政治觀。特別是個人思想受時局的制約，以及個人企圖改變時局的艱難，從他短暫的一生可以得到證實。

參考文獻

- 洪鎌德，1998。《從韋伯看馬克思：現代兩大思想家的對壘》。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13。《當代政治社會學》。台北：五南圖書。
- 洪鎌德，1998。《馬克思與時代批判》。台北：五南圖書。
- 洪鎌德，2020。〈韋伯國家觀的析評〉《二十一世紀評論》179期，頁4-19。
- 姜新立（編），1997。《分析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理論典範的反思》。台北：五南圖書。
- 高承恕，1988。《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台北：聯經。
- Anter, Andreas. 2014. *Max Weber'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Origins,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trans. by Keith Tribe. London: Palgrave.
- Baumgarten, Eduard. 1964. *Max Weber: Werk und Person*.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 Beetham, David. 1974.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 Birnbaum, Norman. 1953.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arx and Web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 pp. 125-41.
- Birnbaum, Norman. 1991.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arx and Weber," in Peter Hamilton, ed. *Max Weber (1): Critical Assessment*, pp. 4-20. London: Routledge.
- Eliaeson, Sven. 2000. "Constitutional Caesarism: Weber's Politics in Their German Context," in Stephen Turn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eber*, pp. 131-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70. "Marx, Web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Sociology*, Vol. 4, pp. 289-310.
- Giddens, Anthony. 1991. "Marx, Web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Peter Hamilton, ed. *Max Weber (1): Critical Assessment*, pp. 21-41. London: Routledge.
- Gouldner, Alvin. 1955. "Metaphysical Pathos and the Theory of Bureau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9, pp. 486-506.
- Kaube, Joachim. 2020. *Max Weber: Ein Leben zwischen den Epochen*, 5. Auf. Berlin: Rowohlt Verlag.
- Mommsen, J. Wolfgang. 1974.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 Mommsen, J. Wolfgang. 1989.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Collected Essays*. Cambridge: Polity.
- Mommsen, J. Wolfgang. 1990. *Max Weber and the German Politics, 188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Radkau, Joachim. 2015. *Max Weber: A Biography*, trans. by Patrick Camiller. Cambridge: Polity.
- Turner, Stephen, ed. 200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rianne. 2009. *Max Weber: A Biography*, trans. by Harry Zor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Weber, Marianne, hrsg. 1936. *Max Weber, Jugendbrief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 Weber, Max.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Talcott Parsons. London: G. Allen & Unwin.
- Weber, Max. 1946. *From Max Weber*, trans. by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Free Press.
- Weber, Max.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by Talcott Parson. London: W. Hodge.
- Weber, Max. 1958. *The City*, trans. by Don Martindale, and Gertrud Neuwirth.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3 vols. trans. by Ephraim Fischhoff, Hans Gerth, A. M. Henderson, Ferdinand Koglar, C. Wright Mills, Talcott Parsons, Max Rheinstein, Guenther Roth, Edward Shils,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Weber, Max. 1971.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Johannes Winckelmann, hrsg.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 Weber, Max. 1976.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Johannes Winckelmann, hrsg. Berlin: Kiepenheuer & Witsch.
- Weber, Max. 1992. *Gesammelte Schriften*, Rainer Lepsius, und Wolfgang J. Mommsen, hrsg.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 Weber, Max. 1994. *Political Writings*, eds. by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2004.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Sam Whimster, ed. *The Essential Weber: A Reader*, pp. 38-39. London: Routledge.

- Weber, Max. 2018.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Hamburg: Nikol-Verlag.
- Wikipedia. 2020. "Erich Ludendorf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ich_Ludendorff) (2020/12/14)
- Wikipedia. 2020. "Max Web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x_Weber (2020/12/14)
- Wikipedia. 2020. "Otto von Bismarc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tto_von_Bismarck) (2020/12/14)
- Wikipedia. 2020. "Wilhelm II, German Emper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helm_II,_German_Emperor) (2020/12/14)

Max Weber and the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1880 and 1920: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Weber's Political Thought

Lien-te Hung

Lifelong Chair Professor,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delineation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Germany between 1880 and 1920 as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Max Weber's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vity. Some prominent issues in Weber's political thought were moder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Capitalism constituted the central theme of Weber's work. Amo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ism, he wa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modern rational capitalism and in its origin. Unlike Marx, Weber did not emphasize that capitalism had an inherent tendency to break down and leads to crashes. Weber felt that socialism would entail a universal bureaucratization and a stifling of freedom. He vehemently opposed it whenever he could. He said that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economy balanced each other, but under socialism there would only be one vast power elite that decided everything. In his writings on politics Weber discussed such issues as direct democracy, the role and selection of leaders in a democracy, the relationship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He even fancied the possibility of a plebiscitary leadership in a democracy, owing to his own interest in having 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a plebiscitary leader plays a key role.

Keywords: confluence of nationalism and liberalism, World War One, origins of capitalism, defect of socialism, plebiscitary domination